

## 导 言

只要把历史的长镜头伸向世界古代文明区，一组清晰可辨的动人场景就会立刻展现在眼前：中国文明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山耸入云天，任你从哪一个角度察看，都有她存在的巨大空间。

伟大的中国文明，并不单体现于那些举世瞩目的物质文化，例如横亘东西的万里长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气势恢宏的明清故宫，以及被今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代兵马俑……

伟大的中国文明，也并不单反映于那些灿烂辉煌的精神文化，例如中国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久的文字，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内涵丰富、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学艺术天地五彩缤纷、高峰迭起，中国的科学技术除“四大发明”泽及全球外，数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领域也长期领先于古代世界……

伟大的中国文明，还深刻地渗透并表现于揭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史学园地中。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度，古代史学家前赴后继，角力争先，拓荒不止，屡辟新绿。根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著录，中国最常见的历史文献就有正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 大类。

当前关于世界文化体系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无论何种观点，中国文化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所谓“两大文化体系”中，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双峰并峙；在“三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西洋文化鼎足而立；在“四大文明区”中，东地中海文明区（包括埃及、巴比伦、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泊尔等）、印地安文明区（包括玛亚、印加等）和东亚文明区（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等），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区的主体。

放眼种类繁多的历史文献，最惹人瞩目的要数鼎足而立，被誉为“三大史体”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三类文献中的任何一类都可以由远而近地连续不断地反映中国历史，而纪传体位居“三大史体”之冠，在全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独领风骚、腾誉学林，具有最大的典型性。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将纪传体文献大书特书一笔。

纪传体文献有悠久的历史。汉人司马迁（公元前 145—约公元前 90 年）是纪传体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史记》大约成书于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就是说，当东方这位史学巨匠完成了他的中外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著作大约 40 年左右，西方的风云人物、一代史家儒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 101—前 44 年）的八卷名作《高卢战记》<sup>①</sup>才开始杀青，而当罗马帝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 59—公元 17 年）正忙于编写西方第一部通史《罗马史》的时候，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业已问世大约 60 多年了。《罗马史》上起罗马建城初期的公元前 742 年，下终公元一世纪初叶的奥古斯都时代，反映了前后约 800 年的历史。而《史记》上起黄帝，下穷汉武，将三千年历史冶于一炉。纪传体文献的悠久还在于两汉以下，代不绝书。从《史记》到《清史稿》，每一朝代都有相应的纪传体文献来反映。二十六史，问世时间各异，上下相比，距离遥远。最后一部史书《清史稿》完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而第一部正史《史记》的写成，距今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纪传体文献有丰富的内容。无论是纪传体通史，还是纪传体断代史，都有极其广泛的涉猎。它不像政书、舆地书那样仅仅侧重于学术领域某一方面，而是多角度、全方位透视，把以往的社会当作一个立体的历史舞台来研究。可以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

凯撒《高卢战记》大约写于公元前 52 年。据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  
李维撰写《罗马史》始于公元前 29 年（征引同上）。

济、军事、民族、文化 纪传体文献中应有尽有 无所不包。相比之下，与《史记》大体同一时期的国外历史著作就并非如此了。西方的名著，无论是稍在其前的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公元前 200—前 118 年）的《通史》还是稍在其后的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抑或是李维的《罗马史》 都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即反映的内容往往集中于战争 而不及于社会全貌 重视政治、军事 而忽视经济、文化 强调个别英雄人物，而忽略不同层面的典型。两相对照，纪传体文献广博的内容更显得可贵。

纪传体文献有严谨的体例。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皇皇巨著 体大思精 五种体例 各有区域。至班固《汉书》 体例更为严谨。故而 史事虽然纷乱如丝，反映在纪传体中却是井然有序。如果说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史记》体例堪称难能可贵的话，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系统反映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二十六史”悉以纪传体同一体例上下相接 浑然一体 有如一气呵成。纵观世界古代史林，像中国纪传体文献这样体例严整而又始终如一者，绝无仅有，委实是举世罕见的一大奇迹。

纪传体文献有惊人的规模。从留存至今的著作来看，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 不乏鸿编巨制。纪传体通史如司马迁《史记》有 130 卷，郑樵《通志》有 200 卷。“二十六史”中的断代史除姚思廉《陈书》仅有 36 卷外 其余起码在 50 卷以上。如《旧唐书》、《新唐书》、《元史》、《新元史》、《明史》等都在 200 卷以上，《宋史》则有 496 卷 更有《清史稿》多达 529 卷。至于洋洋大观的整个“二十六史”系列则有数千卷之巨。如此规模的历史文献设若出自现代当然说不上什么“之最”，而出自中国古代，特别是出自两千多年来有条不紊、默契配合的连续编纂，其中有些史书的编纂还是出自当时条件下的个人之手，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纪传体文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它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编写史

书固然已经用不着纪传体了，但是，研究纪传体文献却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领略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和“两河”文明出现大块“文化断层”不同，华夏文明就像孕育、滋养它的黄河、长江之水那样，一泻千里，奔腾不息。中国文明这一悠久的特征在纪传体文献中有系统的体现。“二十六史”以《史记》的《五帝本纪》为先导，由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颛顼、帝、唐尧、虞舜拉开中国文明序幕，直至《清史稿》反映宣统政权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并不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其间轰轰烈烈，气象万千，揭示了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从涉及的社会形态看，纪传体文献重点反映了封建社会由萌芽、形成、发展、兴盛、衰落，直到灭亡的全过程，同时也以一定篇幅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状况。从揭示的民族成分看，纪传体文献不仅描述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记述了历史上的匈奴、契丹、回鹘、女真、鲜卑、蒙古、藏、满、苗、彝等少数民族，以及后来完全与汉族融合的其他古老民族的情况。正因为如此，纪传体文献反映的政权既有中央王朝，又有地方割据政权；既有汉民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两千年前的《史记》和稍后的《汉书》中，就已经明确地规定了中国历史是“人史”而非“神史”的基调。在纪传体文献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农工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这与西方情况相比大相径庭。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4年）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在他的代表作《希波战争史》中，神话传说充斥其间，全书九卷，卷名悉以女神缪司名字命名。由古代到中世纪，西方史学一直没有离开神学迷信的怪圈，总以为有一个超越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类的命运，甚至以为历史是上帝旨意的体现。当然，中国纪传体文献中也不乏宗教色彩和冥冥世界的幻影，但其分量毕竟是极其次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生机勃勃的人的社会。或许正是基于此点，与人事大有关系的时间概念在

纪传体文献中显得非常重要 并且呈现出日益明晰、精确的趋势。“三代”以前 人事渺茫；学者多称五帝 尚矣”；百家言黄帝 其文不雅驯 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而到夏商周三代时已有世系可查（《史记·三代世表》）至周代，以共和行政（公元前 841 年）为分水岭，共和以后、战国以前发生的一切大事均有准确纪年可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代以后更是逐月可详了（《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其二，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了解古代中国灿烂的文化。纪传体文献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文献，它通过本纪、世家和列传，不仅再现了历史伟人的丰采，还反映了他们对当代和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著述或业绩。他们中有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那样的政治家，有像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那样的思想家，有像孙武、孙臆、曹操、诸葛亮那样的军事家，有像张衡、蔡伦、祖冲之、郭守敬那样的科学家，有像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那样的文学家，有像司马迁、班固、范晔、司马光那样的史学家。纪传体文献还通过“书志”这一体例，使许多古代重要典制尽收眼底。例如看《地理志》可以了解古代政区的宏伟及沿革变迁，看《河渠书》可以洞悉重要的河防水利工程，看《食货志》可以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看《礼乐志》可以了解中国礼乐制度的丰富，看《选举志》可以了解古代“审官取士之方”，看《百官志》可以了解职官制度和官僚体系的严密，看《兵志》可以周知历代军事组织变迁之迹，看《天文志》可以了解当时自然现象及节令时序的变化，看《舆服志》可以了解古代车马服饰的概况，看《艺文志》可以了解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和伟大。

其三，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学习中国先人的光荣传统。中华民族既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又有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的美德。如果说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美德在纪传体史书中有很多反映（例如记述诸子或典型人物关于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统一的论述，以及中国古代在国际关系方面不尚暴力、“协和万邦”的思想

等），那末，纪传体文献通过大量的人物列传，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揭示得更为充分。试看——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高风亮节、坚贞不屈的伟人志士。为了追求光明和正义，他们顽强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的屈原虽死犹生，他的品德与《离骚》一样长驻人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中的苏武光彩照人，为后世树立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形象；谭嗣同虽然只活了 34 岁，但他与刘光第、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四）。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致力事业、百折不回的杰出楷模。司马迁曾无端遭受腐刑摧残，“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所以能坚强地生活下来，是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史家的天职，欲使其作品“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为达其目的，“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汉书·司马迁传》）；唐代的杜佑“位极将相，手不释卷”，为了资治当代，用 30 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典章制度史《通典》（《旧唐书》本传）；明代李时珍研讨医学，执着其间，“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明史·方伎列传》）。上述这些人物固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为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目标，他们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执着精神永远令后人感奋。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由于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迫使封建社会中的广大农民举行多次起义。这种为推翻地主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总计不下数百次。中国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固然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其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使后人震惊。陈胜、吴广“揭竿为旗”，浴血奋斗，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不可一世的暴秦（《史记·陈涉世家》）；唐末农民军领袖黄巢藐视封建统治，自号冲天大将军，一举攻入长安，毅然建立大齐政权（《新唐书·逆臣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与清廷对峙十余年之久，沉重打击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

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外农民起义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篇章（《清史稿·洪秀全列传》），当然纪传体史书的大多数作者出于敌对的阶级立场，多有污蔑不实之辞，但农民起义的宏伟场面和斗争锋芒依然在字里行间清晰可见。

在纪传体文献中，有许多为反对其他民族征服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爱国英雄。名将岳飞“尽忠报国”矢志抗金，虽屡遭奸人暗算，后来又有种种酷刑加身，仍念念不忘收复河山，至死不改初衷（《宋史》本传），文天祥兴兵抗元，进行一系列殊死的斗争，兵败被俘后，坚贞不屈。面对软硬兼施与百般利诱，文天祥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当元人索要招降书时，他递过去的竟是掷地有声的千古名篇《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本传），虽然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岳飞、文天祥式的人物不免于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斗争精神依然伟大闪光，应予肯定。

在纪传体文献中，还有许多抗击外来势力侵略，奋勇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尽管史书中反映中华民族自古有崇尚和平的美德，即使在国力强盛时也不炫耀武力（例如修筑万里长城不是为了侵略而是出于防御，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通商和友谊），但是，一旦出现外来侵略势力，便不乏拿起刀枪守卫国门的热血男儿。明代倭寇肆虐于东南沿海，民族英雄戚继光身先士卒，率领“戚家军”大小 80 余战，屡发电举，屡摧大寇（《明史》卷二一二本传），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保卫了中国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清朝道光间，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残害中国人民。林则徐大义凛然，置各种威胁利诱于不顾，毅然收缴“烟土二万余箱”，并“亲蒞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本传），他还亲自布置，组织战备，沉重打击西方强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上述各类闪光的历史人物，实在是古代中国的脊梁。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研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

的话 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 明白了 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 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华盖集·忽然想到》)如今,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早已今非昔比,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例如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等)仍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

其四,研究纪传体文献,可以体会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中外文化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很早以前,中国文化就通过种种渠道输往世界其他国家,西域、南洋及周边邻国都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姑且不论西方文明如何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仅以东方两个近邻日本和越南为例,即可略窥一斑。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但海洋隔不断中国文化的频频东传。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唐代“开元初(日本)又遣使来朝 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赉 尽市文籍 泛海而还”。日本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 因留不去”云云。至于越南 影响更深。越南独立前 人材选举同于中州,独立后仍仿中国科举制以诗文取士。据《明史·安南传》记载 越南黎太祖“置百官 设学校 以经文、诗赋二科取士 彬彬有华风焉”。典制之外 诸如医学等科技亦复如此。《明史·安南传》中还记载:直到明代时,越南的药物仍靠中国供给。黎仁宗曾委派使者百余人来华,请求用土产香料换取中国的药材和书籍。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输出的同时,其他民族文化亦输入中国。在物质方面,诸如玻璃、琥珀、香料、水晶、石榴、葡萄、苜蓿、蚕豆、胡萝卜 以及天马、鸵鸟、狮子等等 皆来自域外各国。在纪传体文献中 从《史记》中的朝鲜大宛等列传为起始 直至《清史稿》中的缅甸、暹罗、阿富汗 设立了数以百计的“外国传”。我们可以从中查到有关外国文化输入的具体记载。试以大宛(今浩罕)大秦(罗马)缅甸为例。《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 中国的葡萄、苜蓿源于大宛:“宛左右以蒲陶为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来 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 大秦“有夜光璧、明玉珠、骇

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献象牙、犀角、瑇瑁 始乃一通焉”。在《清史稿》中记载 乾隆五十二年 缅甸王孟云派使来华 携带‘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 绒毡、洋布四种’等等。与物质文化输入的同时，精神文化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印度文化为中国输入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并对中国整个学术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以史学园地为例 即使堂而皇之的‘正史’中也不乏印度寓言和传说的痕迹。如果说《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记的郭宪、樊英喷酒灭火酷似当年佛图澄行事，《三国志·魏书》中的曹冲称象亦雷同印度故事 那末，《三国志·蜀书》中的刘备双手过膝、两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的形象 以及《晋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宋史》等史书中所写的开国君主的一系列超常的生理现象，则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夸大其辞的影响。当然 影响不止于史学 例如《新唐书·西域传》中还记载了唐太宗派专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结果是“色味愈西域远甚”云云。

人类的生命在于运动，文化的生命在于发展。人类没有运动就不可能生存 民族文化没有纵向传递固然出现‘断层’而没有内外交流则意味着失去活力。中国古代文化能够由古而今地纵向传递、继承发扬，与不同区域的内外交流、取长补短有重要关系。从纪传体文献反映的情况看 无论是“文化输出”还是“文化输入”文化交流本身都是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文化，民族文化正是在彼此交流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试看正史等文献中的中、印两国：中国文化因为移植了印度文化而注入了活力，而佛教从中国的倒流，特别是中国纸和中国丝的输出，亦使印度获益匪浅。研究古代纪传体文献，目睹历史往事，对加深理解现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自觉维护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 甲 源 流 篇

在百花竞放的中国古代史学园地中，纪传体文献不仅是历史最悠久的史籍之一，而且在诸类史籍中堪称“史运亨通”绝无仅有。从宏观上考察纪传体文献两千多年来产生、发展的道路，实可谓一帆风顺。特别是其中“正史”发展的道路，可说是一条相当特殊的路——宽广、平坦而又笔直，是一条包括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在内的其他任何一种史体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幸运”的路。

### 一 纪传溯源

学术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史记》是纪传体的开山之作，司马迁是纪传体文献的奠基人。这样说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司马迁发凡起例，对纪传体整体建设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不过，要历史地、追踪溯源地进行研究，则纪传体仍然有一个孕育、萌芽的逐渐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像纪事本末体确立于南宋而并非源于宋人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政书体崛起于唐代而不能说始于唐人杜佑的《通典》那样，纪传体文献虽勃兴于西汉，但决不能说它是由司马迁一人独自发明创造的。它的产生，在司马迁之前还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单就纪传体文献的历史而言，《史记》问世以前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纪传体文献的幼年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区分为两个阶段：孕育时期和萌芽时期。

## (一) 孕育期

殷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也是纪传体文献的孕育时期。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这一时期纪传体文献的存在，但是史苑中有一个现象却引人注目，即历史记载的所谓“四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始末，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映。“四要素”是编写纪传体文献、也是编纂一切史籍的最起码的条件。恩格斯曾经明确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 and 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1页）由此可见，“四要素”对编纂历史文献、特别是对编纂比较复杂的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文献是何等的重要。放眼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不仅“四要素”有所反映，而且还呈现出日益完善的态势。

首先是时间、地点概念的反映。以时间为例，当时的时间记录采用的是干支纪时法。殷商、周初的甲骨文一般是纪日于文前，纪年月于文后，顺序是日、月、年。例如“甲午卜，其又岁于高祖乙，三牢”（《殷契粹编》163）。又如“庚午卜，贞，禾有及雨，三月”（《殷虚书契前编》4·29·3）。至周代金文时期，纪时顺序已调整为年、月、日、辰，明显地接近于后世一般习用的纪时方法。如“唯十又三月庚寅”（《中霱》）。又如“唯王四年八月丁亥”（《散氏敦》），地点概念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甲骨文中已有具体地名，金文中更为普遍。例如“大克鼎”铭文中出现的“埜、淝、匭、隰原、寒山”等皆是地名。很显然，时间和地点概念的明晰，为纪传体文献中反映各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规定了明确的活动范围。

其次是记述人物方面的变化。殷代甲骨文中固然已有人物的记载，但多系笼统的泛指，而少具体的个体。如其中每每出现的“王”，并未指示是哪一个“王”。再如其中涉及史学领域的“作册”、“史”、“尹”等名词，这些概念仅仅是指当时记录史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的一

批官员的职业和官位，也并未区别出是张三或李四来。至周代，有关文献中不仅表明了具体的人物，而且还揭示出人物的身分地位、个性特点及语言风格，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例如《尚书·周书·康诰》：“（成）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成王这样说：康叔，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啊……。’）又如《尚书·周书·康王之诰》：“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太保召公和芮伯一起走向前，互相作揖后，共同向王叩头说：‘恭敬地禀告天子，伟大的上帝更改了大国殷的命运……。’）”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明显体会到形象、感情诸因素，这种文学色彩的出现，实为以后纪传体文献兼具文学性质开启了先河。

关于事件始末的记载。从目前可知的甲骨文文献中少有记述，即或有，亦极其简略。至周代，金文中已有明显进步。至于《尚书》中的有关记载就更加典型了。例如其中的《周书·金縢》篇，以“金縢”（周代金属档案柜）为线索，记述了周公报国赤诚大白于天下的事情：周公祈祷上天保佑武王病体早日康复，“三叔”叛乱，造谣惑众，年幼的成王听信谣言，周公蒙受不白之冤；成王看到当年周公保存在金縢中的祷词恍然大悟，周公的忠诚终于为世人所知。《尚书·周书》中还有《顾命》和《康王之诰》两篇，《顾命》篇叙述周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康王之诰》则是康王即位后的第一篇诰词。这两篇内容相连，曲尽其意，叙述的实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始末。从事件的记述情况看，虽然还远不及以后史书叙事之详备，但记史离不开记事，记事则需首尾兼具的思想意识和写作技巧，则为以后纪传体文献记述诸多历史事件提供了经验，指示了途径。

## （二）萌芽期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我国史学的童年时期，但与商周时期相比，则又是纪传体文献的萌芽时期。“萌芽”的显著标志是纪传体文献的雏形《世本》问世了。

《世本》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性质的史籍。

《世本》究系何人何时所作 文献缺乏记载 历来议论不一。或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 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 凡十五篇 与左氏合也。”（刘向《别录》）或曰《世本》系“古史官记黄帝以来 迄春秋时诸侯大夫……”（班固《汉书·艺文志》）。甚至有人以为“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大夫之世 终乎秦末 号曰《世本》十五篇”（刘知几《史通·正史》）根据《史记·赵世家》“集解”征引 是书称赵王迁为“今王”由此可以推知此书成于战国时赵王迁时期 前 235—前 228 年 的史官之手。

《世本》最早曾经刘向校定 是为二卷本 东汉时又有宋均的《帝谱世本》和宋衷的《世本》注本 尔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递相著录 至北宋前亡佚。宋之《崇文总目》已不见著录。南宋时 高似孙《史略》中忽又著录《古世本》 清张澍著录《世本集注》 王漠著录《世本辑本叙录》、秦嘉谟著录《世本辑补》等等，可见南宋高似孙以后历代著录的《世本》统系辑佚之作，无一完本 残缺殊甚。不过 根据若干辑本及诸书征引 仍可窥得《世本》的概貌。是书凡 15 篇 其体例有帝系、本纪、世家、传、谱、居、作、氏姓、谥法等。其中 以“帝系”记述黄帝以来尧、舜、禹等帝王的世系；“本纪”记帝王事迹；“世家”记诸侯；“传”是记述卿大夫的专篇；“谱”分为“王侯谱”和“卿大夫谱”等不同系列。“王侯谱”记述夏、商、周三代及鲁、宋、齐、卫、秦、晋、楚等二十多个诸侯国君的谱系。“卿大夫谱”记述各国卿大夫的世系；“居”篇记帝王所在的都邑；“作”篇记礼乐、饮食、兵农、车服、图书、器物、艺术等创造发明；“谥法”阐述谥号含义 类似后世史书之志。

《世本》原作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目前所知的断片资料亦可看出，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 适应学术需要，《世本》初步建立了一个新型的规模可观的史体——纪传体。《世本》是一部通史 这部通史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的历史舞台，使以往其他文献相形见绌。甲骨文和金文自不必说，即如《尚书》、《春秋》、《左传》等历史名著在反映时间和空间上也都不能与《世本》同日而语。从时间上看，《世本》上起黄帝，下迄作者当代；从内容上看，有人物本纪、世家、传（上自帝王，下至大夫），有表谱（王侯谱、卿大夫谱），有典志（氏姓、谥法、作篇、居篇等），其涉猎范围固然不及后来《史记》之广博，但场面亦属广阔，大有纵贯古今又要包罗万象之势。尽管它的框架还仅仅是纪传体通史雏形。

其次，《世本》的出现为《史记》等系列纪传体文献的问世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消将《世本》同后世的纪传体文献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后来的纪传体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志等体例不仅大体上可以在《世本》中找到，而且各种体例的义项也大抵接近，或一仍其旧。无怪乎东汉学者桓谭评论说：“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所谓“《周谱》”就是《世本》中的“王侯谱”、“卿大夫谱”之类。清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也指出：“《汉书·古今人表》权舆于《世本》。”由此可见，《史记》等文献的框架建设从《世本》中得益不少。此外，《世本》内容丰富，资料珍贵，是历代学者研究古代不可或缺的典籍。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更是分外重视此书内容，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使用过《世本》原著的有关部分。班固曾就此评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汉书·司马迁传》）南朝刘宋著名史家范晔同样说得直截了当：“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以成《史记》”（《后汉书·班彪传》）。这就足以证明，不惟《世本》的体例、框架为司马迁采用，就是书中的具体内容也都成了《史记》参考的重要资料来源。毋庸置疑，《世本》的出现，在促进《史记》的早日问世和推动中国古代史学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任何一件重要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以《世本》为代表的纪传体文献的破土萌芽也有诸多原因。就史学本身而言，它的产生与这一时期各类历史文献的发展有关，特别是编年体文献的蓬勃发展对

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编年体文献是中国史坛上出现最早、历史最悠久的一种以时间为纲的史书。依照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观点，“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史通·六家》)。就是说，编年文献早在商周时候已经产生，最初被人称之为“春秋”。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文献风行于学术领域，几乎独霸史坛。墨子曾说过：“吾见百国春秋。”(《墨子·明鬼》)当时编年史最负盛名的国家是鲁国、晋国和楚国。孟子就曾经提到过“晋之《乘》楚之《桡杙》鲁之《春秋》”(《孟子·离娄》)。晋国的《乘》、楚国的《桡杙》和鲁国的《春秋》都是当时编年体文献的名篇。从这一时期留传后世的代表作来看，它们的编纂水平已相当可观。例如《春秋》记述的对象既有王朝，又有侯国，记述的内容既有水、旱、日蚀、地震等自然现象，又有各国间的征伐、会盟、应聘等活动。《左传》综记各国，场面更加广阔。其中记人物，记战争都很有特点。例如描写赵盾、晏婴、晋文公等人物各具特色，神采焕然。反映长勺之战、城濮之战、殽之战等战争场景时，往往错落有致，悲壮激烈。编年体与纪传体本不是同一种史体，但两体之间没有天然鸿沟。编年体的上述成就对纪传体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及典制诸体例的创建和反映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纪传体中随时可见编年体的踪影，特别是纪传体中的“本纪”实际上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帝王编年大事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早期编年体编纂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纪传体的产生。

就社会因素而言，社会形态的剧变对纪传体史籍的产生也有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正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分化的变革之际，新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空前复杂和激烈。各阶级、各阶层的学者或思想家无不根据自身利益和要求，对宇宙、社会、万事万物提出主张或作出解释。思想领域里这种空前活跃的学派林立、互相诤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开发、创新当代史家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和渗透作用。此其一。此外，还必须看到《世本》是适应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从春秋五霸

迭兴，到战国七雄崛起，奴隶主阶级犹如强弩之末，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连连败北，而新兴地主阶级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奋勇进击。特别是在战国后期，称雄诸国无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呈现出勃勃生机，因而无不具有兼并天下归于一统的进取气势。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世本》这一纪传体通史的问世正是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试图由分裂割据的局面朝着大一统前景发展的历史心态的反映。

当然，对殷商以降迄于战国时期的史学应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科学估计。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史学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惊人成就。例如史学范围扩大了，反映人物、事件的写作水平提高了，各种史料的集累增加了。特别是纪传体萌芽《世本》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史学正向新的台阶迈进。所有这些，都为未来的司马迁的《史记》的问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包括《世本》在内的整个历史文献领域还存在若干问题。第一，文字简略，记事不完整。商代甲骨文一般在十字左右，多则数十字，最多的也不过一百多字。西周金文比甲骨文有一定进步，但是一般铭文也局限在一百字左右，最长的毛公鼎铭文也不过 32 行，497 字。同一时期的《尚书》也有类似情况 其中的《商书》和《周书》除个别地方外 多系帝王、贵族们的简短语录。至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大有进步，但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例如，经孔子删定的名作《春秋》仍然是简略的语录式文字资料 以致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流水帐簿”。《春秋》记事 每条最多 40 余字 最少者竟只有一个字。第二，记事彼此割裂 缺乏有机联系。甲骨文、金文记事简单，往往是东鳞西爪 只言片语 彼此独立 没有系统 缺乏整体性。《春秋》虽是编年体名篇 但逐条记事 前后左右也不相联属 很难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左传》比《春秋》有进步 但也并非有机联系的整体。《世本》是纪传体文献的萌芽之作，其开创之功固然不可磨灭，但毕竟未脱幼稚之气。书中记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表现手法如何，由于原文佚失惨重暂不作评，只消看看那些孤立有余，统属不

足的体例，不难想象：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纪传体的纵横交错的整体框架，还需要走相当远的一段路程。史学领域中存在的上述若干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一艰巨、伟大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未来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肩上。

## 二 纪传开创

纪传体的开创之作是《史记》。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 145—约公元前 90?)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人。少年时“耕牧河山之阳”；十岁则“诵古文”。汉武帝元封三年(前 108 年)，38 岁的司马迁开始继任父亲司马谈之职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前 104 年)他和上大夫壶遂等人制定的《太初历》颁行天下，同时他也从这一年开始了《史记》的撰写工作。天汉二年(前 99 年)正当他“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报任安书》)的时候，“李陵之祸”从天而降，给他以致命打击。司马迁因为替败将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投入监狱，并处以残酷的腐刑。他备受折磨、凌辱之苦，环墙之内，“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同上)。由于遭受到上辱祖先，下辱人格的酷刑，他几次要“引决自裁”，但一想到《史记》还“草创未就”，终于“隐忍苟活”下来。太始元年(前 93 年)出狱后的司马迁被朝廷委任为中书令，而他无意仕途，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史记》。从此更加发愤著述，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终于实现了他的宏大理想，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永垂不朽的史学巨著。

### (一) 建立体制

从司马迁挥洒如椽大笔写《史记》到东汉班固撰修《汉书》之前，这一时期属于纪传体文献的开创时期。据文献记载，这一阶段新体乍出，史家无不跃跃欲试，写作纪传体文献者不乏其人。除司马迁外，还